

漫步在時代與學術的光影之間

對談人：張國良^a、周葆華^b

^a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上海市，中國大陸

^b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上海市，中國大陸



張國良教授
(Prof. Guoliang Zhang)

「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未來可見趨勢，大體為智能化、媒介化、融合化。首先是智能化，由於相關技術含量很高，就技術層面而言，傳播學者主要處於學習、觀察、追隨的角色，儘管如此，當然還是必須積極參與探索智能技術對人類傳播的深遠影響。其次是媒介化，媒介化固然已成為日常現象，但其內涵和外延仍在不斷深化，……值得傳播學界重點關注。最後是融合化，融合化雖然一直在進行，但學科內外的融合化都不夠理想。……在此過程中，最為要緊的是，傳播學如何作為主導力量來產出一些創新性理論？目前已有不錯的苗頭，還需持續努力。」——張國良教授

張國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全球傳播研究院院長。研究興趣：中外傳播史、新媒體傳播、政治傳播、發展傳播、國際傳播。電郵：mddp@163.com
周葆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新聞學院副院長。研究興趣：新媒體傳播、計算與智能傳播、受眾與傳播效果、輿論研究。電郵：zhoubaohua@yeah.net

Walking Through the Light and Shadows Across Times and Academia

Discussants: Guoliang ZHANG^a, Baohua ZHOU^b

^a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Mainland China

^b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The foreseeable trends in fut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generally include intelligentization, mediatization, and convergence. Firstly, there is intelligentization. Due to the high technical content involv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mainly play the roles of learning, observing, and following. Despite this,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xplor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on human communication. Secondly, there is mediatization. Although mediatization has become a daily phenomenon, its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are continuously deepening, deserving focused attention from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inally, there is convergence. Despite the ongoing convergence,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the discipline remains inadequate.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most critical question is how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an be a leading force in producing innovative theories. While there are promising signs, continuous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Guoliang ZHANG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Director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mail: mddp@163.com

Baohua ZHOU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Dean).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computational and AI communication, audience and media effects,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Email: zhoubahua@yeah.net

張國良教授簡介

張國良為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曾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教育部文科(傳播學)重點研究基地首任主任、中國傳播學會創會會長。兼任台灣世新大學上海學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中國傳播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與《移動媒介與傳播》(*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編輯顧問。獲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中國改革開放30年十大傳媒思想人物、中國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家、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教育傑出貢獻獎、范敬宜新聞傳播教育良師獎、國際傳播學會費雪導師獎(B. Aub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等榮譽。主持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教育部重大項目以及與美、英、澳、日、韓、新加坡等國合作項目等七十多個課題。在海內外,包括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出版五十多部著作,發表一百餘篇論文。

GZ: 張國良

BZ: 周葆華

BZ: 您大學本科(1973年秋)入讀復旦大學新聞系,一路在新聞系求學、工作,卻於1985年跨系、跨學科到復旦大學歷史系深造,並以日本大眾傳播史為題,取得了與日本早稻田大學聯合培養的歷史學博士學位。依您看,新聞學以及您後來主要從事的傳播學,與歷史學之間存在哪些關聯?歷史學的博士學習對您之後的學術生涯意味著甚麼?

GZ: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在那個時候,跨學科學習的選擇或者說舉動,確屬少見。那我為甚麼會「異想天開」呢?實際上,當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想通過讀研究生,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提高「學歷」,二是提升「學力」。如果僅僅為了「學歷」,選擇新聞系當然是一條捷徑,老師都熟悉,考試也不難,但考慮到自己還希望,毋寧說,更希望「學力」即研究能力,能有大的提高,或者是質的變化,所以我感到,繼續在新聞系學習,就不夠了。尤其是

我當時已想定，如果考取碩士，打算以日本新聞史為研究對象（我對日本新聞史的興趣，源於1981年我被公派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的機遇）。那麼，怎樣才能把這個題目做深、做透呢？顯然，新聞只是表象，它植根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要真正了解、全面把握日本新聞史，就必須對日本的整個歷史擁有更多、更深的認知。

說到這裏，就顯現了這次選擇的內因，即我個人性格的一個特點是，追根究底，總希望把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研究透徹，就是說，求知欲和好奇心還比較強，不願淺嘗輒止。我被公派出國前，原來是學英語的，對日本並沒有特別關注，但既然有機會接觸了日本，我就想把它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徹，產出一些對國家、對學科發展有益的成果。

這次跨學科「旅行」之所以能如願，也離不開外因的作用，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環境比較寬鬆。整個校園文化良好，具體到新聞系、歷史系的領導，都不但不反對，而且很支持我跨系深造，我的恩師吳傑教授也很歡迎我，這讓我很感動。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於1985年通過全國碩士入學考試進入了歷史系深造，後來又以碩博連讀的方式，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最終獲得了中日聯合培養的歷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得比較順利，主要內容是從中國學者的視角，考察、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大眾傳播史的演變、發展過程，對中國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意義。這樣，我就跨越了四個領域——新聞學、傳播學、歷史學和日本研究，而最終我選擇了傳播學作為自己的志業。

就新聞學、傳播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而言，可以說是同有異、各具特點，互相不能替代，但可以補充。比如，新聞學和歷史學都是關於事實的學科，但一個面向現在，一個面向過去：新聞反映現實變動，用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話說就是「監測環境」，歷史總結過往經驗，也就是「傳承文化」；新聞學是人文學科，而歷史學是兼有人文、社科性質的綜合學科。人文學科的主要旨趣在於提升人生意義，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探究社會規律。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共同點在於，都是探索傳播現象的學科；不同點在於，前者是人文學科，以新聞為研究重點，即總結「新聞傳播」這一專業傳播的特殊規律（以優良的新聞作品來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而後者是社會科學學科，以「日常傳播」的一般規律（而非特殊規律）為研究對象（以合適的傳播理論來解決社會的溝通問題）。

迄今，有一種誤解仍然存在，即以為凡涉及傳播的研究都是傳播學研究，這顯然是不對的。涉及傳播的研究或學科太多了，如文學、藝術學、廣告學、公共關係學等，它們不僅涉及傳播，而且都以傳播為主要內容，對吧？但它們都不是傳播學。這裏的一個關鍵差異就在於，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專門或專業（「專門」意味著需要一定的技能，而以專門為職業就成了「專業」）傳播（即文學傳播、藝術傳播、廣告傳播、公共關係傳播）的特殊規律，而傳播學研究的是日常傳播的一般規律。

至於傳播學和歷史學的聯繫也十分密切，歷史構成傳播的基礎，而傳播塑造歷史的形貌。傳播的歷史固然重要，值得探索，如我的博士論文就考察日本大眾傳播的歷史。反過來說，歷史本身也離不開傳播，甚至可以說，沒有傳播，就沒有歷史。同時，傳播學與歷史學在科學性方面，也是契合的。

總的來說，跨學科的學習和交流，也就是我在歷史學領域的研究經歷，讓我大受裨益。主要的收穫有：開闊了學術視野、充實了理論基礎、加強了研究方法、避免了封閉狀態。如果說，大學本科的新聞學背景，已賦予了我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則研究生的歷史學訓練加倍地鞏固了這一取向，即：言須成理，言必有據；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尊重事實，探求真理。

BZ：您自1991年夏開始承擔傳播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並隨後完成了由新聞學者轉變為傳播學者、由日本/歷史研究為主轉變為中國/現實研究為主、由思辨/定性方法為主轉變為定量方法為主這三個方面的轉型。您能否講述一下如何完成事關自身學術志趣或者說研究方向的選擇？

GZ：博士畢業後，跨學科學習的背景確實給我帶來了重新選擇的幾種可能性：我既可以繼續研究新聞，也可以研究傳播（我在研究日

本新聞史的過程中已受到傳播學的影響，故題目從最初的日本新聞史擴展成了日本大眾傳播史)，也可以研究歷史，當然也可以集中研究日本。

這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我的本科階段畢竟在新聞系度過，因此，對現實的興趣終究大於對歷史的興趣，加上當時主講傳播學課程的老師因故離職，領導來詢問我是否願意接替他。考慮了幾天之後，我表示同意，就此決定了此後二、三十年的學術道路。

日本的留學經歷，對我的轉向也有不小的影響。1988年，我在讀博期間，再度赴日，在為博士論文收集資料的同時，關注日本傳播學界的動態，多次參與他們的各種學術會議，並觀察了日本學術團體的具體運作情況，當時，正逢日本最大的新聞與傳播學學術團體「日本新聞學會」更名為「日本大眾傳播學會」，如實地反映了時代潮流。我發現，他們的傳播學已以定量研究為主，儘管我當時尚未確定要轉向傳播學，但不可否認，這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願意創新的性格也起了積極作用。我從來都願意嘗試新的事物，不會因為一個東西陌生，就望而卻步，而是覺得，嘗試就是一種樂趣，甚至就是一種人生價值。而且，我也不相信，如定量分析那樣一種研究手段，會難到自己掌握不了的程度。

綜上，在個性特點、學習經歷、時局變化、領導安排等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在不經意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上述三個轉變。

BZ：1998年，您曾設計「中國受眾與傳播效果」項目，隨後在中國首次開展以三個傳播學經典理論——「議程設置」、「知識溝」和「涵化」理論為參照的實證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您當時主要出於何種考慮，構思這一研究計劃？在中國開展受眾與傳播效果實證研究，與西方是否有所不同？相關研究在今天可以如何繼續發展？

GZ：在世紀之交，我不無驚訝地發現一個問題：傳播學自1978年引入中國已逾二十年，卻幾乎還沒有出現規範的理論導向的實證研究。這裏說的實證研究，主要指定量研究（其實，那時定性研究

也少有人問津)，它們不但數量少，而且缺乏理論取向，大多是應用性強、理論性弱或完全沒有理論目標的受眾或市場調查。我問自己，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始終停留在以知識介紹為主、以應用性研究為主的階段，那麼，這個學科怎麼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呢？任何學科都必須以理論為支柱，以發展理論為追求目標。恰好我在1998年入選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計劃，獲得一些經費，就設計了這樣一個「中國受眾與傳播效果」項目。

這個項目是以三個傳播學經典理論為參照的定量研究，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並且，從一開始，就依據本土特點來設計研究。回過頭看，這一思路正確而重要，正因為立足於中國本土的特點來開展研究，故而，得出了若干有意義的結論。以議程設置功能 (agenda-setting) 研究為例，一個主要發現是，在中國受眾的認知中，公共議題可細分為社會議題和個人議題，這兩個議程的排序明顯不同，大眾媒介的議程與社會議程高度契合，而與個人議程不太一致。這一發現補充、豐富了議程設置理論，後發表於國際核心期刊《傳播學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並受到廣泛關注，成為當年(2012年)全球社會科學被引率居前10%的論文。這說明，任何國家的學者，包括中國學者，只要確有發現，產出了具有特點和新意的成果，並以國際同行能接受到的方式發表，就可望獲得國際同人的評議和肯定，產生國際影響。

我們開展「知識溝」研究時，同樣想定中國有一些不同於美國的特點。如美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已不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而中國東部與西部地區之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故研究設計中就著重比較了中國東部與西部的差異。可是，一個意外且有趣的發現是，就「知識溝」現象而言，中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卻未見顯著差異。原因何在？原來，由於我們比較的具體對象，是上海和蘭州這樣兩座分別代表東西部的大城市，儘管它們之間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準差距很大，但兩地的教育水平持平(因多所大學從沿海內遷至蘭州所致)。故而，這一因素對於「知識溝」狀況(具體而言，蘭州民眾對國內國際時事的認知水平一點不亞於上海民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可見，在中國開展的傳播學實證研究，與其他國家不大可能完全相同，從研究設計到過程、結果，都理應呈現出本土特點、創新思維和學術意義，這是中國學者應有的自覺。不過，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後，在加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外之間趨同的部分其實越來越大。

歸根結底，我認為，地球村中的各個國家的人民並無本質差異，他們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基本相同。因此，我們面對其他國家(大多是發達國家，但也不盡然)學者的發現，就不應簡單地貼個標籤稱其為「西方的」理論，事實上，社會科學的成果，其本性是服務於「全人類的」。凡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更是如此)的學說，如果在所有或多數國家和地區得到驗證和認同，則就具有了不同程度的普遍性，不然，也成不了被認可的理論。社會科學的根本任務或存在價值，就是追求普遍性，沒有普遍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基於這一理由，其他國家學者提出的社會科學理論，就不太可能在中國完全不適用(反之也一樣)。就傳播學而言，我迄今沒有發現存在這樣的理論。若是如此，就等於設定了一個前提，即：中國人和外國人是本質不同的人種，但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證據。

當然，「性相近，習相遠」，不可否認，中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確實還有很多相異之處。比如，整體教育水準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如前述的「知識溝」研究顯示，上海和蘭州的「知識溝」差異不明顯，就源於兩地教育水準的趨同，但蘭州顯然是一個特殊的個案。因此，在中國開展研究，就特別需要注意城鄉差別、教育水平的差距，注意大城市、小城鎮、農村之間的異同。不過，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的共性，而非中國獨有的問題。還有一些差異，可能存在於東西方國家之間，如東方或者說亞洲國家民眾的集體主義意識更多一點、等級觀念更強一點，但客觀地說，這些都不是人類本性、本質層面的差異。

立足於形勢巨變的當下，一方面，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的發展，導致世界各國的趨同化加速，另一方面，中國的這些產業成長都比較快，與發達國家日漸拉近了距離。可是，硬件

和軟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發展，不一定是成正比的。無論如何，對中國傳播學者來說，在虛心學習各國同行的優點和長處的同時，還是要充分注意本土特點，根據本土需要和特點來設計研究，而非簡單地驗證（儘管理論驗證也是必要的，因其是理論應用的前提）既有理論。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吧。

BZ：您曾主持開展「中國發展傳播學」項目。該怎麼理解「發展傳播」這個概念？在中國開展「發展傳播學」，應當側重注意哪些問題？

GZ：當初的思路比較單純，覺得既然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然特別需要研究怎樣通過傳播（主要是大眾媒介）來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是，後來發現並不那麼簡單，我們越來越覺得，傳播只是多種力量中的一個因素，它必須與其他方面的力量匯合起來，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發展。就是說，我們對發展傳播學，有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認識過程。總的來說，該研究發現，對發展而言，傳播（即大眾媒介）是僅次於經濟和教育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至少能給相關機構提供參考，讓他們更加重視媒介的作用。

如今回過頭看，一個感想是，傳播學研究本身具有局限性。即，傳播學的特點是，廣度或廣延性強，而深度或深入性弱，傳播往往只是表象，它植根於各種個人與社會心理，以及群體、組織、政治、經濟等結構之中，因此，很多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並不在於傳播，而在於社會、心理、經濟、文化等領域。這樣一來，我們就需要借助其他學科的理論或視角來開展研究。比如，上述的發展傳播學研究發現，大眾媒介在發展中確實扮演著重要角色，這與前人結論大體一致。但是，如果多問幾個為甚麼——媒介究竟為甚麼重要？它與經濟、教育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它究竟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它對人們究竟有哪些真實的、具體的影響？它的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果有何異同？以上各種問題，就需要更加深入的、跨學科的研究了。

另一個認識是，我越來越感覺到，單靠定量研究，對事物全貌的把握，對真實的人與社會互動的認識，往往力有不逮，這裏，就顯示出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假設現在再來開展這項研究，在理論思考和解釋深度方面，無疑都能有所加強，並引入定性方

法與定量方法配合。其實，中國當下仍十分需要同類研究，但相關探索似乎越來越邊緣化了。

BZ：您主編出版了《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並以傳播過程的五個環節(傳者、媒介、內容、受眾、效果)為研究對象，聚合一批學者，出版了《新世紀傳播學研究叢書》(共五卷)。該如何看待引介國外傳播學經典理論和從事本土具體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

GZ：如前所說，我們率先開展了規範化、理論化的實證研究，由此足證理論的重要性。既然取向是理論化的，那麼，如果對理論一知半解，淺嘗輒止，甚至不乏誤解，就不可能承擔這一重任。理論化的研究，當然也離不開方法。打個比喻，若要順利開展社會科學研究，讓它「起飛」，理論和方法就好比是兩翼，缺一不可。理論和方法都是為研究服務的，而理論更佔首要地位。

如前面提到，在世紀之交，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已過去了二十年，中國傳播學的理论化實證研究竟然還沒起步，同時，我也不無驚訝地發現，學界對傳播學經典文獻的翻譯和介紹，依然嚴重欠缺。為此，我於2003年出版了《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其中的很多文獻都是首次翻譯過來。《新世紀傳播學研究叢書》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內容比較深入、全面地述評了經典學說的脈絡和精要。總的來說，這個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以一本譯著和五本專著的勞作，為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築土培基」的積極作用。後來，各種翻譯著作就越來越多了，顯然，這是傳播學科成長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奠基階段。

BZ：您為中國傳播學的學科建制和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您如何評價中國傳播學學科目前的發展狀況？對於中國傳播學學科更好地發展，您有哪些主要的建議？

GZ：我的認識是，對一個學科來說，研究之外的學術行政工作也很重要，這具有為學術研究鋪路搭台的功能。如果把學科比喻為火車或飛機，需鋪設軌道或跑道；如果把學科比喻為房屋，需搭建腳手架以及各種材料的結構或框架；如果把學科比喻為人，則需要提供舞台，讓其在舞台上一展身手。學科建設或者說學術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就在於此。

我在機緣巧合之下，被推到學術行政管理的位置上，即擔任了教育部的文科（傳播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在此期間，創立了中國傳播學會和中國傳播學論壇，後來又到上海交通大學創立了全球傳播論壇，聚合全國同行舉辦了國際傳播學會區域性大會等，為學科建設做了一些工作。現在看來，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起到了鋪路架橋、搭建平台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相比二十年前，當下的中國傳播學界，無論學術研究還是學科建設、人才培養，都有了長足進步，可謂成效顯著。

在我看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未來可見趨勢，大體為智能化、媒介化、融合化。首先是智能化，由於相關技術含量很高，就技術層面而言，傳播學者主要處於學習、觀察、追隨的角色，儘管如此，當然還是必須積極參與探索智能技術對人類傳播的深遠影響。其次是媒介化，媒介化固然已成為日常現象，但其內涵和外延仍在不斷深化，尤其是平台媒介、個人媒介與專業媒介之間的競合、博弈，構成了當代媒介版圖的一大景觀，值得傳播學界重點關注。最後是融合化，融合化雖然一直在進行，但學科內外的融合化都不夠理想。從內部看，技術發展消解了原先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之間的界限，可是，這三個領域至今仍各自為政，雖有一些融合，但尚不多見，如果融合得好，則很可能出現更多的創新性成果。從外部看，傳播學尤有必要與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管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有更多、更深的融合，以激發靈感，在此過程中，最為要緊的是，傳播學如何作為主導力量來產出一些創新性理論？目前已有不錯的苗頭，還需持續努力。

中國傳播學如何才能更好地成長？我覺得，對傳播學的學科特性和發展規律，仍有必要進一步思索、釐清。我在這裏提出幾個關係，以供討論：

第一，科學性與人文性。如果我們承認傳播學是社會科學，則它必定以科學性為主。然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一樣，都是以人為研究對象和服務對象的「人學」，都植根於人文關懷。作為傳播學人，對此應有更多的自覺。

第二，普遍性與獨特性。傳播學研究不僅以普遍性為主要目標，而且，以日常傳播的一般規律而非專門傳播的特殊規律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是我近年來感悟到的一個道理。何謂「專門傳播」？比如，小說、詩歌和書畫創作，就是專門傳播，它們需要具備一定的專門技能，也就是說，具有一些特殊規律，屬文學和藝術學研究範疇。又如，我們平時的交談，屬日常傳播，不需要特別技能，但相聲或演講，就屬專門傳播，一般人不具備這些技能。再如，人們互相交換新聞，也不需要專門技能，屬日常傳播，但新聞記者採寫編播新聞，就屬專門傳播了，儘管其門檻不是那麼高。任何「專門傳播」，一旦作為職業，就成了「專業傳播」。

大眾媒介播出的節目中，包含了很多專門傳播的內容。比如，電視劇、廣告等，但傳播學並不關注其如何創作的特殊規律，而把它們作為整體看待，著重研究其構成一般規律的傳播效果。比如，某段時間裏、某種類型節目中的傾向、特徵，及其對受眾的影響和效果等，即主要著眼於與大眾和社會的關係，媒介對大眾和社會產生的整體性影響，而這一視角，恰是文學、藝術學、廣告學等缺乏或不重視的。它們主要關心、研究怎麼才能創作出兼有商業性和藝術性的作品來，至多附帶關注一下受眾的反響。

大眾傳播還有一個特點，即它是單向型傳播活動。從傳者（包括經營者、創作者、播出者等）角度看，具有專業傳播性質，從受眾角度看，則是日常傳播。換言之，專業傳者的各種產品一旦向非專業受者輸出，就連接、展開了日常傳播的過程。現代社會的公民，幾乎每個人都免不了要接觸大眾傳播的內容，接觸之後多多少少會受影響，傳播學就以此作為研究對象，揭示了許多一般規律，比如，5W模式(Lasswell's Communication Model)、議程設置理論、「把關人」(gatekeeping)理論等，它們普遍存在於各種傳播過程之中。比如，沒有一個傳播過程中不存在把關人，對吧？必定有這個角色，文學、戲劇、音樂、繪畫等傳播活動中，都可見到這一規律，莫言寫小說，他是自己的把關人，出版

社審查他的作品，則出版社又成為他的把關人，層層把關，可謂無處不在。

第三，時代性和局限性。傳播學適應人類傳播技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潮流和時代需求，因而，獲得了格外引人注目的成長，突顯了其時代性，但同時，應充分注意到自身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即第四至第六）三個方面的情況。

第四，廣延性與深入性。以我之見，作為一門側重於分析人類特性——溝通與整合——的橫向型學科的傳播學，以研究「溝通過程」為己任，強於廣度、廣延性，而弱於深度、深入性，如我上面提到的，這既是一個特點，也是一個局限性。

第五，應用性和基礎性。與上述特點相聯繫，相比文史哲、政經法以及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傳播學的應用性強於基礎性，故而，以中觀理論、微觀理論為主，少有宏觀理論。諸如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會運動等方面的理論，來自社會學；情緒、情感、心理活動等方面的理論，來自心理學；而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也有一些理論被傳播學使用，但這些理論都不屬於傳播學。為此，我經常有一種感覺，傳播學這個學科領域十分熱鬧，但根基不深。

這一話題，可再略加延伸。從5W的過程看，除了廣為人知的效果研究之外，還有受者研究，更多地借鑒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傳播學自身也有一些原創理論，如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論，但並不多；另有傳者研究，傳播學的原創理論同樣不多，「把關人」理論可算一個（既因為創始人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被視為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也因為該理論後來在傳播學領域裏得到了長足發展），但也更多地借鑒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可是，並沒有完整意義上的內容研究，對吧？因為如上所述，對各種專門傳播內容之特殊規律的研究，已分別歸屬於各個學科。那麼，媒介研究呢？作為傳播學的一個重點領域，它擁有較多的、僅次於效果研究領域的原創理論，最近引介了不少來自哲學學科的理論，即所謂「媒介哲學」，這些理論對傳播學無疑有啟迪意義，但需要釐清的是，它們其實屬於哲學範疇。

第六，主體性和交叉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傳播學無疑應當向其他學科虛心學習，積極開展跨學科的交叉研究、合作研究。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能消解了自身的主體性，也就是說，必須避免反客為主、喧賓奪主，導致被其他學科支配或主導的結果。否則，就有可能「作繭自縛」，構成又一個局限性。

事實上，傳播學從來沒有關起門來，排斥對外交流與合作，而是一直有很多的跨學科研究，甚至可以說，相當頻繁地借用著其他學科理論。可是，不能不警醒的是，當我們借用其他學科理論時，切勿產生錯覺，以為這樣就等於自己有了創新。

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個現象，即當前確實有很多理論是共享的，並且，其他學科的學者當然也可以總結日常傳播的一般規律，比如，「信息繭房」假說就來自法學者。那麼，如何判定一個理論是否屬於傳播學的理论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取決於理論本身的性質，即該理論是否有助於把握傳播的一般規律？學者本人的學科歸屬則比較次要。仍以「信息繭房」假說為例，我們自然不必糾結作者的學科身分，而可將其列為傳播學科的學說。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總有一些新概念流行，但未必都科學、適用，流行一陣之後，也就煙消雲散了，對學界來說，要緊的是，這些概念對傳播學的發展究竟是否有實質性的貢獻？這一判定，理應有兩個標準：一是原創性如何？二是解釋力如何？唯有兩者兼備，才能稱為實質性的貢獻。

BZ：接著這個問題，從大眾傳播時代進入數字媒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哪些研究問題是重要的？當傳統傳播理論可能不適用於當代媒介語境，您覺得傳播學理論該如何創新？

GZ：理論創新的過程，取決於各種條件和因素，有時會不期而至，有時會突發靈感。總的來說，現在人們對傳播學科似乎抱有某種期待。我覺得，還是要強調剛才提到的融合性，包括學科內部的融合和外部的融合、學界和業界的融合，雖然不容易，但值得努力地嘗試。我們不可能掌握尖端的技術，只能了解技術的基本性能和應用概要，主要的著眼點，還是人與人的交流，包括用戶與技術、機器、企業、媒介、平台等(所有這些「器物」、「結構」的背後仍然是人)的互動，而終極的目標，還是在於人文關懷。

前面已聊到新技術帶來的變化，傳播學者如何應對。總的來說，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將帶來哪些問題，仍然有待觀察。我覺得，在各種維度中，它對個人，尤其是弱勢群體，可能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值得重點關注。它又對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傳播結構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也應當格外受到重視。

我目前的認識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優勢，還是在功效方面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提高了人們學習、工作、生活的效率。當然，也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終將超越人的大腦，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在其尚未超越人類的前提下，其功能和價值，就是讓人們的生活、生產更有效率。

或許，我們也不必對理論創新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即日常傳播的一般規律，其實沒那麼多，容易發現的幾乎都已被發現了，剩下不多的規律，發現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BZ：您長期致力於國際合作和交流，從中獲得的主要經驗是甚麼？中國傳播學的國際化或者國際交流，還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GZ：我的理解，國際化就是和國際通行規則、前沿理念接軌，是一個追求卓越的過程。這種需求，永不過時。且不論當下我們與國際前沿還有距離，即使將來距離縮短了，我們仍應謙虛謹慎，積極地向世界範圍內的優秀同仁學習，取長補短，當然也要努力超越他們。一方面，從前面提到的搭建平台或學科建設的角度，需繼續創造機會，保持並擴大交流；另一方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則應通過這一過程，不斷提升中國學者的研究能力，優化中國學者的成果質量。

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是，由於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學人也十分努力，因此，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得到了國際同行的相當尊重。比如，我們舉辦全球傳播論壇、國際傳播學會區域性大會等，他們都非常支持，這是我們進一步開展交流與合作的基礎。我們應當珍視這種機遇，儘管迄今為止，時間還不是太長，但只要我們持續地努力下去，就可望形成一個良好的傳統。

中國傳播學人作為一個整體，是具有全球視野、世界眼光的，是永不止步、勇往直前的。今後，期待學界同人進一步推動、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如此，就將有越來越多的優秀成果走

向世界。原先我們是以輸入為主，現在是輸入和輸出並重，未來當有更多的輸出。近年來，國內的國際期刊越辦越多，也是一個向好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者有機會與國際同行展開更多的合作，更有效地推動中國傳播學科的進步。

BZ：您曾指出：無論中外，就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言，新聞傳播學界的一個無可避免的態勢是「趨同」；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和地區，無不具有自身文化的獨特性。中國傳播學者該如何發揮獨特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貢獻？

GZ：一方面，傳播學終究是一門社會科學，當然，也需要問：「怎麼看待它的人文面向呢？」我認為，理應支持、鼓勵這種面向的存在，至少可以豐富本國和各國人們對中國民眾傳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認識。無論從這當中能否抽象出一般規律，都沒關係，因為這本來就不是賦予人文學科或人文面向的任務。同時，我也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在文化多樣性、獨特性背後最深層次的地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也是趨同的，不同的往往只是形式。因為各地人們內心深處最根本的人性是相通的，所以，特殊性和普遍性很難截然劃分。概而言之，我們既要堅持追求理論研究的普遍性，也要充分重視本土文化的獨特性。

另一方面，當社會科學學者提出一個理論時，其普遍性或適用範圍究竟怎麼樣？比如，這個理論在世界其他地方不適用，但是，在中國適用，那應該也是一個好的、有用的理論。然而，這種理論究竟是否存在呢？如前面提到，概率很小，因為各國人民的本質和本性是相同、相似的，但會不會在這個前提下，由於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不同而出現一些非本質的差異呢？比如，在前述的議程設置功能研究中，我們發現，中國民眾的個人議程和社會議程不太一致，這是中國特有的規律，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律？目前還不得知，但就算是例外，唯有中國存在，我們還得承認，這種只適用於特定區域的發現或規律性總結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前提是運用這個發現或總結，確實能幫助、促進這個區域更好地發展。仍以議程設置功能在中國顯現的規律為例（儘管這並非提出新的理論，而是對既有理論的補充，但不妨用來分析其中道理），對兩個議程的不一致，

是應當保持還是改變呢？若改變，是縮小還是擴大呢？不過，討論至此，問題已超出了理論本身，而涉及人們對理論的態度了。

BZ：祝賀您今年榮獲國際傳播學會費雪導師獎。您之前也曾多次獲得優秀研究生導師獎等榮譽。您對指導、培養學生有哪些主要心得和經驗？

GZ：作為中國大陸第一位獲獎者，我自然感到非常高興和欣慰。這不單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國際傳播學界對中國大陸同人的肯定。為此，我由衷感謝眾多幫助、支持過我的人們，尤其是我的研究生們，如果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作為導師的）我。不言而喻，導師和學生是一對不可分離的存在。而且，一路走來，我真切地感受到，這一百多人也形成了一個融洽、互助的學術共同體。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我最主要的體會是，必須尊重學生的自主性，激勵學生的創造性。具體地說，又有三個方面的認識和舉措：

第一，身教重於言教。凡導師要求學生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要做到。如導師要求學生嚴謹、創新，則自己就得以身示範，率先表現出嚴謹、創新的品格來。

第二，育人重於教書。學生畢竟年輕，富有可塑性，如果導師不在品德方面盡力地正面影響學生，則學生的道德品質出了問題，誤入歧途，就不是培養人才，而是生產「廢品」了。

第三，授漁重於授魚。導師應從思維方式、學術視野、分析能力、人生哲理等方面，全方位地引導、培育學生，這些涉及世界觀、方法論的交流，既是具體的專業知識學習不可替代的教育路徑，也是培養「全人」（即人格健全、素質完善的公民）的時代必需，當然，貫穿這一過程的理應是啟發式的對話，而非灌輸式的指導。

BZ：如果從1976年本科畢業留校算起，您從事教師職業近48年了。對於青年學者、學子，您有哪些主要建議？

GZ：回顧48年的職業生涯，我的主要心得，或可概括成一句話，「對於功名心，不能無，不能過，不能偏」。

一個人如果沒有功名心，也就相當於沒有上進心。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或學子，如果沒有了上進心，談何遠大前途呢？但是，

如果功名心太過，超出了主客觀條件的範圍，那麼也不可能有理想的結果，或透支身心，或怨天尤人，故還是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如果功名心偏了，則更可怕，即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諸如投機取巧、弄虛作假、嘩眾取寵、旁門左道等學界亂象，並不少見，最終害己害人。

具體而言，還有這樣一些感悟，謹供青年學人參考：

第一，早和晚。從目標的確立來說，寧早勿晚。我個人因受限於早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學習、工作都是被組織分配的，故從讀大學到讀研究生，逐步走上學術道路，最終確立目標時，已近四十，是比較晚了。而你們的各種條件比我好得多了，故宜儘早確立目標，包括大、中、小目標，即這一生究竟打算怎麼度過？是成為學者、作家、公務員，還是醫生、律師、企業家？如果確定了走學術道路，則是成為傳播學者，還是政治學者、經濟學者？如果與我一樣，選擇了研究傳播，則是重點探索政治傳播、健康傳播，還是家庭傳播、國際傳播？總之，人生目標的確立，越早越好，一旦想清楚了，就儘早付諸實踐。

第二，快和慢。一個人的發展，從戰略層面看，當然快比慢好，即所謂「成名需趁早」，但從戰術層面看，往往「欲速則不達」，尤其是學術領域，雖然也有天資因素，但無論多聰明，都必須打下扎實基礎，才能行穩致遠。為此，切忌心浮氣躁、急功近利，如果華而不實，把時間都用於追逐虛名或短期利益，最終很可能「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由此看來，「慢」其實是「快」，「快」反而是「慢」，基礎打得越牢，將來成長空間越大。

第三，多和少。與上面說的道理相通，從成果來說，「多」即是「少」，「少」反而是「多」。與其發表多篇泛泛之論，不如產出一篇傳世之作，對吧？人的一生，時間有限，理應惜時如金，把寶貴的時間用在最值得的地方。這樣，方能事半功倍、心想事成。

第四，正和邪。如上所說，無論治學還是為人，或從事其他各行各業，都務必堅持走正道，不走邪路，盡力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如此，當退休之際，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就可以自豪地說：「我這輩子沒做過一件違背良心的事。」這樣的人生，就比較完美，就不留遺憾了！

致謝

感謝復旦大學博士生李泓協助記錄和整理文字。

Acknowledgement

Thanks to Hong LI (Ph.D. Candidate) of Fudan University for assisting with transcribing and editing the text.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研究項目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ORCID

張國良 (Guoliang ZHANG) <https://orcid.org/0000-0001-5581-953X>

周葆華 (Baohua ZHOU) <https://orcid.org/0000-0001-9699-6292>

張國良教授著作選

張國良 (1992)。《現代日本大眾傳播史：1945–1990年》。學林出版社。

張國良 (1995)。《傳播學原理》。復旦大學出版社。

張國良 (1998)。《現代大眾傳播學》。四川人民出版社。

張國良 (1999)。〈テレビ視聴実態の日中比較——上海情報行動調査を中心に〉。橋元良明 (編)，《映像メディアの展開と社會心理》(頁 112–131)。北樹出版。

- 張國良（2003）。《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 張國良（2007）。《社會轉型與媒介生態實證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張國良（2008）。〈上海市民と情報化——情報メディアの普及とその効果に関する実証分析〉。石井健一、唐燕霞（編），《グローバル化における中國のメディアと産業》（頁216–237）。明石書店。
- 張國良（2021）。〈中國傳播學的不惑之惑：寫在傳播學引入中國40年之際〉。李立峯、黃煜（編），《傳承與創新：中華傳播研究40年》（頁27–4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國良（2024）。《我心依舊——張國良學術自傳》。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國良、胡薇（2012）。〈中國傳播學30年：以專業期刊論文為研究視角〉。馮應謙、黃懿慧（編），《華人傳播想像》（頁35–54）。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Zhang G. (2004).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media ecology. In P. S. N. Lee, L. Leung, & C. So (Eds.), *Impact and issues in new media* (pp. 227–244). Hampton Press, Inc.
- Zhang, G. (2023). Mobile media in China: Media practice as a research orientation.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1(1), 80–87.
- Zhang, G., Shao, G., & Bowman, N. D. (2012). What is most important for my country is not most important for me: Agenda-setting effects in Chin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5), 662–678.
- Zhang, G., Zhu, J., Hong, B., Liao, S., Han, G., Ding, W., Long, Y., & Lu, Y. (2006). What's news in China. In P. J. Shoemaker, & A. A. Cohen (Eds.), *News around the world: Content, practitioners, and the public* (pp. 141–164). Rout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 張國良、周葆華（2025）。〈漫步在時代與學術的光影之間〉。《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1期，頁1–20。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 Zhang, G., & Zhou, B. (2025). Walking through the light and shadows across times and academ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1, 1–20.